

“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一生爱国奋进的足迹

□商鸣臣 商秀梅



容闳遗像

一、漫漫留学路

1826年11月17日,容闳生于距澳门不远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父亲容丙炎是个道地的农民。容闳7岁时,其父通过熟人将他送到澳门洋学堂——马礼逊预备学堂读书。父亲只希望儿子进洋学堂便于学好外文将来从事翻译工作。容闳虽聪慧伶俐,却不太用心,起初对这一学校的严格管教也不适应,后因家贫辍学。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堂。在这里他遇

到美国耶鲁大学的神学博士布朗老师,在布朗先生的资助和教授下,容闳进步很快,学习成绩名列榜首。1846年冬,布朗回国,将容闳、黄宽、黄胜带往美国,从此改变了容闳的人生道路。

1847年1月,容闳乘美国洋行的商船,由广州黄埔港起航,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绕道好望角,再入大西洋,经98天的航行,于1847年4月抵达美国纽约港。一星期后,容闳在布朗先

生的安排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孟松学校为新英格兰最有名的预备学校。校长海门“德高望重,品学兼优”,他对容闳特加礼遇,甚望其学成归国。1849年4月,容闳写信给在中国广东的威廉,请他向母亲和姐姐说明继续留美深造的理由,因为原来说定两三年内学成归国。他惟恐母亲和姐姐难以理解,又请威廉向叔叔作详细的解释,说明整个学习需要6年,希望叔叔能协助说服母亲。容闳坦率地告诉威廉,家人担心他信奉基督福音并滞留不归,渴望他尽快挣

钱养家。信中还说:“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到去年冬天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以求符合读大学的要求。”

1848年秋,容闳立志报考耶鲁大学。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也希望容闳入耶鲁大学深造,他们还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校董会规定,要取得这项奖学金,学生必须先具保证书,毕业后要以传教为职业。容闳却认为,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神职传教士,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安逸,而是有益于中国。1850年,容闳取得乔治亚州萨伐郡妇女会的资助,考进耶鲁大学。

容闳在耶鲁大学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在学校,不但一切洒扫拂拭、劈柴生火等都要自己干,“雪深三尺,亦必徒步”,还必须不断地“为人工作”,诸如替同学办伙食,替“兄弟会”管理图书之类,以取得必需的零用钱。在同年的圣诞节,容闳写一封长信给卫三畏博士,其中说道:“大学生活对我会轻松些,如果我在入学前有较佳的准备。在我来耶鲁前,我仅有一年半语文准备。当然问及其他同学时,我惊异地发现,我大多数同学至少念过3年语文,甚至有的念过6年语文,这就是学业考试成绩大有区别之原因所在。享受大学生活,我想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要有不屈的精

力和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的确，容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苦学，“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因为预修不充分，他的数学成绩一直不理想，但文科的成绩弥补了这一缺陷。大学二年级时，他的英文论说连续获得首奖，他在耶鲁重要文学社团——兄弟团结会担任副书记。“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大家充分承认这位优秀中国青年的卓越的学习能力。

将要大学毕业时，他在思想及心态上已完全认同西方的价值及文化。他觉得中国人“无知”、“迷信”及有偏见。他认为西方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立志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

1854年秋，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文凭。他怀着激情给美国同学写下中文格言，其中有“大人者（大人物）不失其赤子之心”、“有志者事竟成”、“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毕业使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留在美国必有好的职业，待遇优厚；回到祖国，必然困难重重，前程难卜。十分熟悉容闳的吐依曲尔牧师说：“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尽管他在大学时已入美国国籍，并以美国为第二祖国，但是他的根在中国。容闳毅然决定，即使前路茫茫，必要回到祖国，为“改造和复兴中国而效劳”。经过154天的航程，27岁的容闳，远渡重洋1.3万海里，于1855年春，船抵香港，经澳门，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

二、归来，初探报国之门

回国后最初的七八年间，容闳

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多次被迫更换职业。最初，他在广州美国驻华使节伯驾那里做文书。这是一个挂名的职务，仅3个月就不干了。这一职务既不能使他学到什么东西，也不能扩大他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他自行辞职，到香港高等审判厅任翻译，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学法律，却很快被当地的英籍律师所排挤而无法立足，被迫离港赴沪。在上海，于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月薪75两银子。从物质待遇上看，较之香港高等审判厅已高出不少，可是海关内贿赂风行，海关官员与商人互相勾结，中饱私囊的丑恶现象，使他深恶痛绝。容闳以今后没有提升机会为由，向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提出辞呈。李泰国以提高月薪到200两银子的高薪劝他改变主意，容闳坚决拒绝。他说：“李泰国没有想到至少还有一个中国人把廉洁、声誉和忠实的人格看得比金钱还重，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政府的机关中得不到一个英国那样的提升的机会呢？”为此，容闳写下自己的座右铭：“一个人想期望他人尊重自己，首先他必须尊重自己！”此后他先后在上海英商公司和宝顺公司充任书记和公司代表，其间赴苏杭和长江中下游各地产茶区进行实地调查，到绍兴收购丝，又到安徽太平县采购茶叶。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内地的民情有了实际的了解和感受。

容闳苦苦寻求报国之门的这段日子，也正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与清廷对峙的时期。出于对清廷残暴统治的不满，他萌发借助太平天国实现其教育计划的想法。1860年11月，容闳来到南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改革天国的七条建议：1. 依正常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 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识军官；3. 建设海军学校；4. 建

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6.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7.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七项建议，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是近代中国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其中心思想仍是“教育救国”。改革军队是通过建设海军学校、武备学校的途径来解决；改革政府的办法是让当权者多吸收有经验的人才，也就是吸收像他容闳这样的通晓东西方政治、科学知识的人才，这还是要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他没有向洪仁玕提出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是因为他感到太平天国没有实现的能力。容闳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发现太平天国在与清廷的对阵中已处于下风，太平军领袖人物的品格、能力、见识，也很难让他相信能最终成事。尽管洪仁玕盛情挽留，并封他为“义”爵，但容闳坚辞不受，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南京，去重新寻找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的道路。

三、留美教育，梦想成真

一个身在异国的爱国者，脑子里往往会把所在国与自己的祖国比较一番。美国的繁荣，中国的贫穷落后，使容闳“时触于怀”、“怏怏不乐”。他痛定思痛，设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那样，能受美国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回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就会使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发达国家。

容闳在走访天京后，吸取教训，决心借助某些有权势的实力人物实现其教育计划。为此，他竭力襄助曾国藩筹备洋务。曾国藩派他到美国购买机器，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博得曾的信任 and 赏识。1867年，曾出任两江总督前来到上海，

容闳陪同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建议在江南制造局旁建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技术人员，曾国藩欣然同意。不久，这所培养中国近代最早一批科技人员的兵工学校建立了。兵工学校的成立，既使容闳所怀的教育计划“小试其锋”，“略著成效”，从而增强他的信心，同时，也使容闳感到曾国藩是关心教育的，可以通过他来实现派遣留美学生的计划。

1867年，容闳向交往密切、志趣相投的江苏巡抚丁日昌谈及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设想，得到丁日昌的支持。丁日昌让容闳把他的计划写成条文，由他寄给军机大臣文祥，再转奏皇帝。容闳向朝廷提出四条原则：1. 组织中国汽船公司；2. 派青少年出国留学；3. 开矿产修铁路；4. 限制教会的权力。其中第二条就是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条陈说：“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这个条陈由丁日昌送呈文祥，请他奏报。不巧的是，文祥的母亲病逝，文祥回家服丧，不久也去世。他的计划也被搁置下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容闳心神不安，他又不甘心于此，还是等待时机。在他看来，他的教育计划如能实现，就能“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派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丁日昌到天津处理教案，容闳以翻译的身份陪同前往。借此机会，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三年前的留学计划。丁接受建议并私下与曾国藩及其他官员多次商讨，最后曾国藩同

意联名向朝廷上奏。对此事容闳回忆道：“一天晚上，他（丁日昌）回到总部已是很晚了，他走到我房间里叫醒了我，告诉我曾总督和其他的官员们一致决定联合在给政府的同意采纳我的四项提议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条新闻太重大了，那天晚上使我不能再入睡，躺在床上时，像一只猫头鹰那样醒着，我感到自己好像腾云驾雾。”

1871年6月，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拟派员设局挑选幼童赴美肄业徐图自强，强调留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奏折还以洞澈本源，“百闻不如一见”等理，驳斥那些认为中国已有学习洋务机构，何必“远涉重洋”等论调。曾、李的联名上奏，得到总理衙门答允后，两人又以同样的内容向皇帝提出，于1871年9月和1872年3月两次联名上奏。清朝廷最终批准了留学计划，并任命陈兰彬和容闳分别为“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正副监督）。

187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选派的留学生开始赴美。8月，第一批30名幼童由陈兰彬带领，在上海乘船赴美，容闳先行赴美安排住宿。1873年6月，第二批幼童由黄胜带领赴美，同行的还有7名自费生。1874年9月，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1875年10月，第四批幼童由祁其照率领前往美国。同行的有徐润自费出国的三位本家弟弟。

幼童到达美国，分别住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省各地的美国人家家里，每家二三人不等，为照顾便利，彼此住得较近。1874年，清朝廷授权容闳在康涅狄各州哈特德市购地建造一座坚固壮丽的三层大楼，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内有监督和教师办公室，也有幼童上课的大教室，还有卧室、餐厅，可容纳75人住宿。容闳在第

二年初，搬进这座大楼。在这几年里，容闳虽然辛苦劳累，但他心情格外畅快，视为他人生“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

幼童赴美后，学习认真，成绩显著。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博览会上，展出了幼童的作业。幼童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美国报刊还加以报道。当时，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宁波海关案牍李圭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博览会，亲自与100位幼童接触，《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把此事详细记载下来，成为研究第一批留学生的珍贵资料。

在博览会期间，美国总统接见了幼童，并与他们一一握手。美国官员还勉励他们用心学习。美国报刊也报道中国幼童在美国的情况以及赞扬中国的留美教育。李圭认为，美国的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思想都是得体的。他还驳斥那些认为出国留学是“下吞本而入幽谷”的谬论。他认为西方的好经验应该学习，为我所用，不应分外国和本国，留学教育可以取长补短，既重要也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国富强的“宏图”。无疑，李圭的见解是比较符合实际，也是中肯的。

但是，正当留学生处在学习的关键时刻，清廷突然命令撤销“留学生事务所”，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眼看大有前途的留学教育要毁于一旦，容闳“顿觉心灰、无复生趣”。美国人民也加以挽留。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闻讯后，亲自找前总统格兰特帮忙。格兰特致函李鸿章，希望中国学生能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国内有识之士，也对撤回留美学生的做法深表不满。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对此甚为悲叹，他说：留学生“分别人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但终究没有

改变清朝廷的决定。

历史证明，刚开始的留学教育，虽然因封建守旧人士的破坏而半途夭折，但它的功效却没有就此宣告结束。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有开风气、创世纪的意义。容闳说：“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四、参与维新运动，心系民主共和

当容闳“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理想落空和美籍夫人凯洛格于1886年去世后，思想受到极大打击，心灰意冷，不知所从，在美国蛰居下来。他是一位有坚强意志和强烈民族意识的人，不会因家庭的不幸和自己的报国事业受阻而放弃追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表示：“我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漠不关心，不能抑制我对中国的热爱。”毅然乘船回国。回国后他曾向张之洞和其他官员提出改革中国的主张。如聘请外国人为中国外交、财政、军事的顾问，建立国家银行，修筑铁路等。这些好的建议，均因清廷的极端腐败未被采纳。到这时，他通过为清政府效命，改革中国的思想已经彻底泯灭。容闳决定改变主意，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甲午战败，既使中国民族危亡日益加剧，也促进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觉醒。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改革中国政治的重大尝试。容闳虽是70岁高龄的老人，他还是热心参与维新派的一切活动。如实现他的造铁路、办银行的计划，参加保国会等。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他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康有为、梁启超出京。变法失败后，容闳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他出逃上海，避入租界，后又避难于香港。由

于清政府顽固派反对中国进行改革，容闳认识到在保留清政府的情况下中国不能振兴，国家也不能富强。他决定另寻途径，首先在1900年支持唐才常起义，接着担任上海自立国会的会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自立军起义事泄，长江一带大捕党人，容闳于9月化装乘船离沪赴日。容闳在日本居留不久，即回香港。1903年初，华侨兴中会会员谢纘泰等发动反清起义。谢居美国时曾与容闳相识，所以在筹划起义时，求他臂助。容闳遂前往美国进行联络。他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便居留美国，在美继续从事救国活动。应该说，这时容闳还没有完全转向革命一边，主张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康、梁的保皇派，共同推翻清王朝，并且和康、梁联系较多。1902年5月，容闳赴美途中在日本横滨与梁启超等人会面，莅美后与保皇派要员多次信函往来，还为保皇会募款。1903年4月，梁启超访美时特意去拜望容闳，两人晤谈两小时。1905年康有为访美时，也去拜望他。容闳两次亲自陪同康有为去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与保皇派斗争愈益激烈，使容闳逐渐觉悟，并同康、梁决裂。1909年，容闳给谢纘泰的信及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均指责康“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还揭露康有为私吞华侨为支援维新运动捐献的大笔捐款。与此同时，容闳更加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称孙中山是一位很重实际的人物，是“最可信赖的”。1909年底，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按约定与容闳见面会晤，这是他们生平第二次见面。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推翻清政府，容闳向孙中山提出“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准备募集500万美元，10万枝枪和1亿发

子弹，为反清武装起义所用。次年2月，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告知其实施“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约请他与荷马·李及布思会晤，商谈借款事宜。孙中山与两名美国友人多次磋商，确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后因美国金融资本家不肯冒险借款，使计划终成泡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容闳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当听到曾为之努力改革的祖国发生巨变时，容闳给谢纘泰写信兴奋地说：“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信中表示：“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特致函容闳，请其“归国任事”。容闳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祝愿“中华民国创一完整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信中建议孙中山组建“一支共和国军队”，表示“诚挚地祝贺你，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这时他已重病缠身，要求谢纘泰转告孙中山：“我的健康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这距离他4月21日病逝只有一个多月。他是多么恋眷着祖国，希望他魂牵梦绕的祖国进步和富强！

容闳在80多年的忧患生涯里，一直密切关心和积极参加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为振兴中华，贡献了他毕生的力量，临终时还嘱咐两个在美国的儿子，必须回国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效力。容闳一生爱国奋进的精神和行动，对于激励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必将产生有益的影响。□